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一般项目

# 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

杨恩玉 著

中华书局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一般项目

# 蕭梁政治制度考論稿

楊恩玉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杨恩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4.9  
ISBN 978 - 7 - 101 - 10355 - 7

I. 萧… II. 杨… III. 政治制度史 - 研究 - 中国 - 南朝时代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2234 号



---

书名 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  
著者 杨恩玉  
责任编辑 李肇翔 张云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刷 北京瑞吉冠中印刷厂  
版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格 开本 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14 1/8 插页 2 字数 36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10355 - 7  
定价 46.00 元

---

该书的出版获山东社会科学院科研基金资助

## 成功的转型（代序）

“恭敬不如从命”的情形中，近十年来，为朋友与弟子的著作献序的任务，似有越来越重的趋势。我一直以为，朋友之“请序”与弟子之“求序”，意味着我的为人处世得到了朋友的认可，意味着我的课堂闲扯与平常交流得到了弟子的肯定，而这种认可与肯定，总是令我感动乃至感激，于是在感动乃至感激中，像样或者不太像样的序，也就越写越多了……

上面的这段文字，是2014年4月4日我为硕士弟子蒋少华《六朝江东佛教地理研究》所写序言的开头。少华是我众多硕士弟子中非常年轻的一位，当时，我就想到了本书的献序任务，因为《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的作者杨恩玉博士，与蒋少华硕士恰成对比，是我众多博士弟子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也因其年龄最长，我对恩玉的感觉，实在介于“朋友”与“弟子”之间，所以习惯以“老弟”称之。而在我与恩玉老弟八年的交往与交流中，既颇多对他成功转型的欣赏，也不乏善意的提醒乃至严厉的批评，毕竟，我之于恩玉，还挂着个“导师”的名分。

关于“善意的提醒乃至严厉的批评”，在本书作者富有感情的

“后记”中已有涉及，而其间的委婉曲折，似乎“不足为外人道也”，所以这里只想说说“成功转型”。

在 2007 年入学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恩玉已有多年的研究经历，围绕着南北朝的战争与人物，发表过多篇论文，2005 年开始，还独立承担了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治世盛衰：‘元嘉之治’与‘梁武帝之治’研究”。按照一般的做法，如恩玉这样带着省级项目来读博士学位的“老童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就着既往的成果、项目与思路，加以整合、拓宽与加深即可，这样彼此方便，恩玉可以轻松获得学位，我也可以少费一些心思。然而浏览或者细读恩玉的论文之后，我既为他的基础扎实、撰述成熟、善于排比资料而欣喜，也觉得他的习惯路数——诸如关注刘裕、刘义隆的猜忌心理与萧衍的骄盈心理，计较什么盛衰原因、影响大小、政策评价、思想分析等等——气象不大，学术积累意义比较浅弱，缺乏可持续性。也许是因为长年从事朴实的历史地理专业的缘故，又也许是半个甲子治史的感悟，我比较倾向的博士论文选题，多为实证性的朴学考据，比如于历史文献则重版本的选择校核，于考古文物则重与历史文献的补证推扩，于人物、事件、制度等等则重史实的“本来”；我甚至曾有这样的“胡说”：史实的考据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史实的评说则是史学圈外人的事情。

让我倍感宽慰的是，恩玉老弟最终接受了我的建议，从他擅长的“评说”转型到更加富有挑战的“考据”，而且考据的对象，是极具研究价值、内容相当繁杂、资料颇为零散、异说非常纷歧的南朝萧梁制度。本来，从习史悟世的角度言，我对几乎与梁朝始终的菩萨皇帝萧衍就情有独钟。我曾对从大学生到博士生之各种层次的同学说，读《资治通鉴》卷 160 到卷 162 梁武帝最后三年纪事而不落泪者，真乃铁石心肠；我曾报给“百家讲坛”的自选讲题，就有“梁武帝启示录”，连同 16 集的分集计划——名号称谓、陵口沧桑、

伐竹沉木、宽大为怀、五经设馆、山中宰相、舍身为奴、青骨成神、东方太阳、洗妇归顺、文化奇观、北伐南奔、浮山堰淮、招降纳叛、慈父逆子、自我得失——都拟好了。如此，我与亦友亦生的恩玉老弟围绕梁武帝其人、梁朝制度的讨论，也就往往言畅意尽，分享着彼此学而且问的收获。在这种分享中，我并没有追问恩玉转型的过程是平顺还是艰难，我所自得的是，即便如恩玉这般已经学有所成的老童生，也能成功转型，这是作为挂名“导师”的我，最为开心的事情，于是对于文公昌黎先生《师说》所谓的传道、授业、解惑，我也因此增添了一份自信。

然则我的自得、自信，证之以弟子杨恩玉 2010 年 5 月博士论文答辩通过、2014 年 2 月完成修改、近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这部《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又可谓不虚也。虽然距离我所期望的系统全面的萧梁制度研究，如《考论稿》“后记”中的自我陈述，或者欠缺了礼制、中枢运行机制、法制、监察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等等专题的研究，或者未及深入探讨萧梁各种制度之间的联系以及梁朝制度对于后世的影响，但作为恩玉博士的学术转型之作，其值得肯定乃至赞叹的方面仍是主要的。比如对于萧梁十八班制渊源的考证，对于萧梁流外七班、三品勋位与蕴位的形成及其关系的分析，对于南朝有无太学的辩驳——如其在“前言·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中的归纳与正文相应章节中的展开，这里不赘——都具有学术进步之旨、研究创新之意、搭建平台之功，也都显示了恩玉老弟深厚的文献修养、坚实的考据功夫、多闻且善疑的学者禀赋；而以这样优秀的修养、功夫与禀赋，再行努力，我相信，恩玉今后贡献出更加周详完善的萧梁制度乃至中古制度研究论著，应是完全能够期待的。

年轻的硕士如蒋少华，相对容易调教，新近出版了《六朝江东佛教地理研究》；年长的博士如杨恩玉，却也存在转型的可能，

即将问世《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而年轻与年长的两位弟子这样的成功，对于当下大陆的研究生培养，或也有些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吧！

是为序。

胡阿祥

于南京龙江三栖四喜斋

2014年7月10日

# 前 言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政治制度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深刻原因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sup>①</sup>

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制度到隋唐制度的过渡时期。由于当时政局动荡，民族融合频繁、矛盾尖锐，阶级关系与统治阶级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社会问题突出，因而政治制度头绪凌乱，内容庞杂，变化多端，从而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和难关。制度史的研究既充满挑战，也有着特别的魅力，如果把时间、空间、人三者比喻为历史的三大支柱，那么制度就是历史的骨架，它支撑并规范着历史的诸多方面。

---

<sup>①</sup>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页。

梁武帝萧衍统治的近半个世纪内，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唐朝史家李延寿高度评价梁武帝：“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sup>①</sup>梁武帝时代不仅是江左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魏晋以来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姚思廉就明确指出梁武帝统治的“三四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sup>②</sup>。魏徵也由衷赞叹梁武帝的统治：“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已来，未有若斯之盛。”<sup>③</sup>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也认为，梁武帝的和平统治，“有力地促进南朝文化进入黄金时代”<sup>④</sup>。萧梁时期文化的繁荣，在政治制度方面有显著体现。萧梁制度的重要历史地位，陈寅恪先生有深刻的论述。陈先生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sup>⑤</sup>在陈先生这一著名论断的基础上，唐长孺先生通过缜密考证，提出了“唐代的南朝化”观点<sup>⑥</sup>。另外，萧梁制度上承魏晋宋齐，

<sup>①</sup> 《南史》卷7《梁武帝纪·论曰》，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5—226页。

<sup>②</sup> 《梁书》卷9《武帝纪下·史臣曰》，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7页。

<sup>③</sup> 《梁书》卷6《敬帝纪·史臣魏徵曰》，第150页。

<sup>④</sup> [日]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7页。

<sup>⑤</sup>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页。

<sup>⑥</sup>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495—501页。

是南朝制度的集大成。这都反映了萧梁制度的重要历史地位。对萧梁政治制度进行断代研究，阐述其状况、特点、影响，有助于认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规律。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政治制度，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诸多疑难问题逐渐得到澄清，面貌日趋明晰。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研究更是日趋繁荣，各类制度的讨论广泛而深入，不仅专题性论文数量猛增，而且各类制度的专著相继问世，特别是职官制、选举制与行政制度等，研究日趋精细，更是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但对萧梁政治制度的研究，尚未引起学者的重视。中外学者一般在对魏晋南北朝、六朝或南朝的某项制度进行专项研究时，或多或少涉及到萧梁的制度，而对萧梁一朝政治制度专题研究的论文凤毛麟角，专著更不用说尚属于空白。因而萧梁的政治制度就成为当今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关于萧梁政治制度的专题论文目前国内还非常少。就笔者所见主要有以下五篇。阎步克先生的《北朝对南朝的制度反馈——以北魏、萧梁官品改革为线索》，从梁官品的“正”、“从”与“上”、“下”等词汇与北魏官品的类似性，萧梁部分官职的品、班的对应性，梁流外七班与北魏流外七品的相似性等方面，深入论证了梁官班制脱胎于北魏的九品正从十八级制度<sup>①</sup>。张旭华先生的《萧梁官品、官班制度考略》，讨论了官班制产生后官品的存废、官品与官班的关系、官品制与官班制的各自作用等问题<sup>②</sup>。张旭华先生的《萧梁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考述》，分别论述了五馆生策试入仕、国子生策试入仕与

<sup>①</sup>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3期，后收入阎先生著《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1—355页。

<sup>②</sup> 《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九品中正制略论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萧梁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的实质及其作用<sup>①</sup>。曹道衡先生的《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从梁武帝与萧统的关系、“梁武帝一贯对待他的兄弟子侄的态度”，以及大臣王筠与新任太子萧纲对萧统的赞扬三个方面，考证梁武帝未立萧欢为太子的主要原因，“不是记恨昭明太子在墓地埋蜡鹅的事”；从梁武帝亲身经历的齐武帝死后的皇权争夺、萧欢年龄弱小、萧宏与萧正德父子的威胁诸方面，论证梁武帝立萧纲为太子，主要是由于“恐不可以少主主大业”<sup>②</sup>。韩国金裕哲先生的《梁武帝天监年间官制改革思想及官僚制上之新趋向》，认为“当时的改革政策虽然仅仅是为了达到眼前的目标——即统合南朝社会，实际上它却促使了新的统治思想以及新的支配体制的产生”；具体说，“梁武帝的官制改革就是，不但改变过去存在的方镇和官僚秩序，而且改变官僚秩序内官位与政治的权威不符合的现象，实现以皇帝为中心的体制。在理念上看，它可以说是把私的秩序吸收于公的体制，国家支配体制追求的新方向”<sup>③</sup>。

可贵的是——一些专题研究著作，对萧梁制度有详细考证或论述。严耕望先生的《中国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行政制度》第一章下的第四节，对梁陈的都督区进行了详细考证<sup>④</sup>。胡阿祥先生的《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第十五章第二节“梁政区建置表（中大同元年，546年）”，对萧梁州郡建置情况作了周详的考证<sup>⑤</sup>。张金龙先生的《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的第十四章“萧梁禁卫武官制

<sup>①</sup> 《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后收入张先生著《魏晋南北朝官制论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

<sup>②</sup>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sup>③</sup>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第162、187页。

<sup>④</sup>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2—84页。

<sup>⑤</sup>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3—493页。

度”，对萧梁的该项制度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sup>①</sup>。阎步克先生的《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的第七章“北魏对萧梁的官阶制反馈”，对前揭论文进行了扩充，揭示出北魏九品正从十八级官阶来源于晋宋官阶，萧梁十八班制来源于北魏的九品正从十八级制度<sup>②</sup>。宫崎市定先生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第二篇第四章“梁陈时代的新倾向”，对萧梁的官班制、学馆与试经制度、孝秀与中正制度，都作出了出色的研究<sup>③</sup>。此外，有关的著作还有一些，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有关萧梁政治制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还相当薄弱。另外，有些结论，尚需进一步讨论。例如，萧梁国子学建立于天监七年（508），包括萧梁在内的南朝没有太学；经学生策试成绩“有甲科、高第、明经、清茂、推第等名目”；萧梁十八班制来自对九品官制的析分；萧梁官班制“是对孝文帝所创类似制度的模仿袭用”；萧梁的官品制度“渐至成了禄秩之制的代名词”，官班制的首要作用是“依据礼秩之别，区分门阀等级高低”，等等。因此，很有必要对萧梁政治制度进行专门研究。

## 二、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萧梁政治制度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可以探讨的制度很多。由于材料的限制，笔者能力和精力的局限，本书选取了其中的八项制度，分专题展开研究。笔者不敢奢望建立一个完整系统的框架体系。因此，本书的结构松散在所难免。每项制度研究的内容多少不

① 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6—597页。

② 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版，第360—409页。

③ 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7—224页。

一，因而篇幅也参差不齐。萧梁时期最引人注目、存在问题又最多的是官班制和教育制度，笔者用力也最多，故二者所占篇幅最多，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第一章萧梁皇储制度讨论了两个专题。一、梁武帝的皇储立长。在曹道衡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梁武帝“恐不可以少主大业”的深层原因：南朝皇权的脆弱和幼主被频繁废杀的历史教训，魏晋以来皇帝和皇储立长的历史传统，固守嫡长子继承制的惨痛教训，梁武帝子侄的雄才和野心对皇权的巨大威胁。通过此后南北朝立皇储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阐明梁武帝的皇储立长是正确的。二、萧梁的太子监抚制度。监抚仅见于太子萧纲。通过北魏的世子监国、萧纲的监抚与太子萧统“省万机”的相似性，证明萧梁的太子监抚是作为一项制度实施的。太子名为监抚，其实仅是监国，表现在对国家一般性政务的处理，特别是对狱讼案件的审理上。太子监抚的名称来源于《左传》的记载，直接渊源是宋齐时期太子监国的类似事例。该制度对陈朝特别是唐朝有重要影响。它与北魏的世子监国在背景和内容方面有很大差异，但也有一些相似性。

第二章萧梁宗室制度分为三个专题。一、宗室的任用制度。论述梁武帝对宗室任用的一系列新制度，阐述宗室的起家官职和起家年龄，重用宗室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二、宗室的管理制度。通过对宗正府和宗正卿的论述，说明萧梁对宗室的管理比前代有所加强。论述梁武帝对宗室的优容，同时揭示梁武帝对宗室惩治的诸多表现，旨在纠正人们一般片面强调梁武帝优容宗室的倾向性。三、宗室的封爵制度。阐述萧梁宗室封爵的等级及其前后变化。朝廷对宗室授爵形式的多样化体现了对宗室封爵的严格管理。宗室封地多分布在经济富庶的荆州、江州、湘州和郢州，改封也多在这些地区，体现了朝廷对宗室的优厚待遇。

第三章萧梁封爵制度，旨在揭示梁武帝授爵和梁元帝授爵的显

著差异，进而阐明其目的和性质的不同。梁武帝对官员的授爵基本发生在登基之后，显著体现出奖功酬庸的特点。对北魏来降者的授爵则出于笼络和利用的目的。梁武帝对官员的封爵管理严格，封爵制成为加强和维护皇权的有力工具。梁元帝对官员的初封多发生在登基之前，并且有些官员无功也授爵，目的是为了收买人心，培植个人势力，为夺取皇位作准备，因而封爵制成为他争夺皇权的工具。他后来对官员的增封与晋封则体现了奖功酬庸的特点。

第四章萧梁官班制度。官班制的性质不同于官品制，它是士庶起家与官员官职迁转的官阶制度。官班制由朝班演变而来，编制标准除朝班外主要是官职的资望与清浊。官班的高低取决于官职的资望，同班内位次的前后取决于官职的清浊程度。官班制建立后，官品制的作用依然如故，并没有变成“禄秩之制的代名词”。官班制是士庶起家和官员官职迁转的主要参照体系，是朝廷对官员奖惩的重要工具。它不但是维护士族利益的有力工具，也为寒庶阶层的人仕与升迁打开了通道。官班制与官品制的同时并用、众多官职的官班与官品的不一致、在官品制中含有的爵位在官班制中则没有，说明官班制并非由九品官制析分而来。魏、晋、宋、齐官职迁转的官班，与梁官班制的性质和排列次序基本一致，说明梁官班制是由魏晋宋齐的官班继承发展而来。《晋选吏令》、《宋百官阶次》和《齐职仪》等官制文献，与反映梁官班制的《梁选簿》在性质与内容方面的一致性，说明它们是萧梁制定官班制的主要依据与直接材料来源。萧梁流外七班、三品勋位与蕴位以及北魏流外七品，与宋齐勋位的诸多类似性，说明二者都由宋齐勋位发展而来。梁流外七班继承了宋齐勋位的官阶数量，三品勋位承袭了宋齐勋位的名称。士族依靠门第从流内十八班入仕，寒微士人凭借才学从流外七班起家，一般庶民从军人或胥吏做起，积累军勋、吏绩、年劳到一定程度才得以从三品勋位或蕴位起家；三品蕴位及蕴位迁流外七班，流外七

班迁流内十八班，三者泾渭分明。因此，三品蕴位及勋位在流外七班之下。州刺史、郡太守、县令长的班次分别为六、十、七。

第五章萧梁官员起家制度探讨了官员起家的途径、官职与年龄。由于门阀士族的衰落、寒庶阶层和贤才主义的兴起，以及梁武帝的限年入仕制度的影响，此前形同虚设的经学生策试和察举策试兴盛起来，成为重要的入仕方式，其中的国子生策试和秀才策试则成为门阀士族非常显赫的起家途径，直接入仕者的数量相对于前代明显下降。征辟主要是下层士族和寒庶阶层的起家方式，军功成为寒庶阶层跻身仕途的重要途径。萧梁时期的起家官和前代相比有很大的变化，除秘书郎仍旧贵显外，著作佐郎、奉朝请、州郡僚佐的地位大大降低，王府与军府参军、王府常侍与侍郎的地位大大提高。起家方式和起家官职贵显者，其仕途畅通、官位较高，反之亦然。萧齐门阀士族二十岁起家，寒门三十岁起家。齐末改为一律二十五岁起家。萧梁士族的直接入仕为三十岁，诸州与正王任丹阳尹时的迎主簿、迎西曹，皇帝或皇后殡葬时的挽郎，入仕没有年龄限制。萧梁官员起家的实际年龄平均不足二十一岁（虚岁），说明三十岁的起家年龄不切实际。

第六章萧梁教育制度。关于南朝太学众说纷纭，主流观点是南朝没有太学。《建康实录》的记载说明，江左的太学与国子学分立两处，相距四里二百六十步，仍然是两所学校，太学并没有并入国子学。宋、齐、梁、陈四朝有关太学实体、内部教学活动、太学生及其冠服的记载，足以证明太学的存在。太学作为传统的学校，是南北方官学的首选。萧梁国子学不是建立于天监七年（508），而是开办于天监元年。萧梁国子学仍是门阀士族受教育的专门学校。不是国学隶属于太学，而是太学隶属于国子学。二者都执行开放式办学方针，在太学和国子学游学者不是在籍正式生员，而是旁听生。萧梁地方官办学校和私学、讲学与辩难之风都空前兴盛。经学生策试

的时间在十一月及其前后，秀才策试在每年的一至二月，地点都在仪贤堂。高第和甲科完全相同，明经和清茂都是策试的科目，而不是成绩等级，擢第就是及第的意思，也不是成绩。经学生策试和察举策试的成绩都分为高第、中第、下第即甲、乙、丙三等，策试的方式都是面试。对萧梁经学生策试的腐败需要正确看待。

第七章萧梁赠谥制度论述了赠官制度和给谥制度两项内容。赠官的类型和特点都比较鲜明，授予的基本条件是官位、必备条件是功德。赠官对于朝廷而言是褒奖官员功德的重要手段；对于享有赠官的家庭而言，赠官是提高其家族地位的重要尺度。依据受谥对象、给溢性质和时间、溢号优劣的不同，给溢有四种分类法。朝廷赐给官员溢号，一般需要请溢、议溢、定溢、册溢四个程序。溢号体现出以单溢、美溢为主以及文武有别等特点。赠官与给溢的联系是：高级官员一般同时享有赠官与溢号，二者往往同时给与，授予的主要条件都是一定的官爵与功德。二者的区别是：二者有时相分离（有赠官者没有溢号，有溢号者没有赠官），赠官主要依据官员的官位，更加侧重官员的功绩；而溢号的制定主要根据官员的品行。

第八章萧梁部曲制度。萧梁的集兵方式有世兵、罪犯及其家属补兵、征发民兵、以降民和降兵为兵、招募部曲五种。招募的部曲是军队的主体。部曲盛行的客观原因是世兵数量锐减、战斗力低下；社会原因是门阀士族衰落、寒庶阶层崛起。部曲的招募方式有六种：朝廷敕令或批准的招募、皇太子下令的募兵、王侯私自招募、官员自行招募、流民主动投募、豪强擅自招集部曲。部曲的成分也有六种：破产流亡的百姓、主将的宗族乡亲、从北魏投奔过来的部曲、降民与降兵、盗贼与流氓无赖、少数民族人民。部曲与世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二者的性质不同，世兵归国家所有，衣食装备由政府供给；部曲则多为主将所私有，原则上由主将的私财供养，实际上官员假公济私、巧立名目，从政府获取各种物资来供养。世